

新时代的“士”，更应“弘毅”

朱晨凯

《士者弘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的思想文集，收录了作者自2004年至今的人文类文章和近期的一些政论文。书中《忆先师陈翰笙》《理想主义与大学》《科学工作者的祖国》等文章曾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书中文章分为三类：士子弘毅的精神、文化自觉的精神、社会主义的精神。主要回答了为什么大学要培养理想主义、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什么是我国百姓能理解的社会主义、如何理解“新时代”、怎样的发展才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什么党和政府要“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如何提高大城市的治理能力等问题，观点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娓娓道来、情真意切，给人以强

烈的思想和情感共鸣。

作为新时代的“士”，如何才能“弘毅”？作者认为要有明确的精神支柱。民族自立系于精神自强，只要精神不垮，中华民族就不会被打垮。复兴大业任重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无雄图不足以负重，非坚忍不足以克险。我国依旧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我们知耻后勇，急起直追。拒绝自贱自残，文化自觉，是我们民族自立的精神支柱。清末民初，不少士子把国家民族的不断挫败归罪于自家祖先，归罪于孔孟、归罪于秦汉以来的“专制文化”，遂鼓吹“全盘西化”。然而，新中国承上启下，树大根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屈不挠，“苟日新，日日新”，仅七十年就创造出举世公认的奇迹。这奇迹又该归功于什么文化？既归功于两千多年

的生存方式孕育的丰富中华传统，也归功于拒绝自贱自残、文化自觉自强的精神。

新时代的“士”，更应“弘毅”。“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孟子曰：“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书中指出，当下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廉洁奉公这三大富强要素还有待提升，作为新时代的“士”，更应站在民众的前面，办大事，引领全民迈向光明的未来；更要站在民众的身边，办小事，在每一个居民区维护社会的正义，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还要站在民众的后面，时刻检讨小事与大事的平衡，时刻警惕失去人民的信任、时刻警惕失去民心。上下同心同德，让贫富尊卑团结如一家，国家和民族才能举世无匹。

随思录

车子被堵将军笑

易其洋

在福建上杭县，流传着一个“堵车故事”：戎马一生的原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晚年时有一次回老家——上杭县。路上，私家车如过江之鲫，这位开国将军乘坐的车子，被乡亲们的奔驰、奥迪等豪车堵在了路上。老将军的警卫员有些不耐烦，埋怨当地私家车太多了。老将军见状，对警卫员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今天，乡亲们都开上了私家车，把我的车堵了，我很高兴。”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上杭县老百姓传说王老将军的“堵车故事”，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民意——老百姓拥戴和尊崇那些为民造福而不与民争利的人，会自觉自愿为他们“树口碑”。而这样“树口碑”，老百姓欢迎什么、肯定什么、反对什么、厌恶什么，一目了然。

老将军的警卫员不耐烦，有其理由：将军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那是多么大的付出和功劳。将军暮年，回乡探亲，老百姓不“肃静回避”也算了，一辆辆豪车竟堵了将军的车子，成何体统？老将军见车子被堵，不仅不恼，还一脸欣欣，是因为他看到自己当年和无数仁人志士出生入死所追求的目标实现了——老百姓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车子被堵将军笑，这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源于老将军心态的平衡和对自身的准确认知。心态平衡还是失衡，有一个尺度可以衡量，那就是，看不看得惯别人比自己过得好。有些官员，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虽说也为人民做了一点事，却无可挽回地滑向了大贪巨腐的深渊。一个重要原因，就如他们身陷囹圄“忏悔”时所说，自己辛辛苦苦多年，日子竟然过得没有有些老百姓好，更不要说跟那些腰缠万贯的富翁们比了；或者是自认为任劳任怨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提拔太慢或升迁无望。

不是比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谋了多少福利，而是跟别人比、跟过去比自己得到了多少好处，一旦觉得自己得到少了，便心态失衡；而心态一失衡，看不惯老百姓住大房子、开豪车，便想着自己“身份特殊”，岂能“混同于老百姓”，官小便跑官要官，“特权思想”，不想手中权力是老百姓给的，想的是“你能过上好日子，是我恩赐的”，要感谢我、让我、顺着我、敬供我，不然就会“不耐烦”“不高兴”“不满意”。看看王老将军便可知，若非心态平衡、自知自明，车子被群众豪车堵了，该会多么气恼，甚或

大耍官威。将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付出是巨大的，但若是没有人民默默支持，没有士兵流血牺牲，单凭一己之力，何来那么大的威名和功绩。将军是人民的将军，自然是感恩人民的养育之恩，莫说是被群众“堵了车”，就算是要为人民作出更大牺牲，也是应该的。王老将军明白这个道理，是难得的自知和谦抑。看看有些官员，说是“人民公仆”，却从不把人民放在眼里，别说是为人民贡献和牺牲了什么，要是不能从人民那里占到便宜，或是人民挡住了他们占便宜、发大财、当大官的路子，他们定要火冒三丈、不可一世；要是为人民做了一点点好事，他们就人民时时记得他们的功劳，处处让他们，让他们“先享受起来”。

应该记住谁，应该感谢谁，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本账。在小商品中心义乌，经营户们记住的一个人叫谢高华。谢高华主政义乌时，开放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定了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的“四个允许”政策，是义乌成长为全球最大小商品中心的开创性人物。

“澎湃新闻”记录的一组镜头，可看出义乌老百姓对谢高华的惦念与崇敬：2017年10月19日，第23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幕之际，主办方邀请87岁的谢高华参加，安排了专车去衢州接他。数百名企业家打好听好时间后，于当天下午2点，在杭衢高速公路义乌上溪互通口，手捧鲜花、摇着拨浪鼓，还有人挑着货郎担，举着“谢书记欢迎您”等标牌，整齐地排在路边。人群的边上，候着19辆黑色奔驰、宝马等豪车，驾驶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义乌商会会长。看到这一景象，激动不已。就算未能亲见，但那样的欢迎场面，不能不让人动容，也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话：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天下已肥，我虽不肥，甚至吾貌弱瘦，我不光不气恼、不失衡，反而感到高兴、感到宽慰，这样为官利民，怎能不让百姓感动和传颂？小而言之，我们的官员要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大而言之，一个党尤其是执政党也得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而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官员之有无和执政党之有无，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官员如果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在老百姓眼中就会一文不值甚至可恶至极；而一个执政党，如果这样的党员干部多了，背离离民意、失掉民心也就不远了。

社科书架



《士者弘毅》
潘维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2

【精彩书摘】

大学为什么要培养理想主义

在今天强调理想主义，不是来争论道德理想与科学精神哪个更重要。今天的人文精神衰落了，特别是在培养精英的一些顶尖大学衰落了。人文精神被商人精神取代，许多顶尖大学向商学院靠拢，才引发了我在这里的话题。缺少了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就堕落，我国社会就不团结，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况。强大的国家是团结的国家，是有精神的，国家，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被称为“大学”？我们的第一个解释是：“社会”的进步需要利他的道德情操，也就是理想主义。

除了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大学生要为社会做准备。大学生要有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精神，成为我们社会关系中积极健康的力量。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第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社会团结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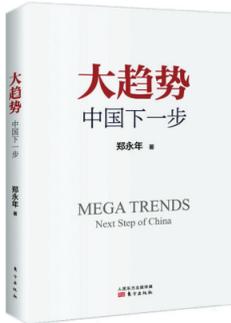
现实生活会摧毁理想，摧毁理想主义。然而，如果大学不鼓励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播撒理想的种子，我们就不会有精英，不会有百折不挠的英雄，不会产生知识泰斗，我们中国社会的进步就会比较低。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许多顶尖大学希望能培养出精英中

的精英，希望这里能出领袖人才。然而，缺少了理想，缺少了人文精神，这里就很容易成为培养废物的地方，甚至频繁出现自杀、精神抑郁症。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的第二个原因是：那是英雄的品德，是领袖的要素。大学只讲分数，不讲“至善”，就不会是培养精英的地方，那里的“精英”经常只是分数的奴隶。

为什么大学的重要内容是鼓励青年有理想，鼓励集体主义？第一，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社会进步；第二，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精英和英雄；第三，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理想的青年，没有我国理想的未来。

【周边图书】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郑永年 著 东方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三月

本书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的挖掘，系统回答中国的改革已经做了什么，改革的现状如何，面临什么新问题和风险，未来的改革作何选择等关键性问题，并予以有益的指导。



《“碎片化”的领导学》
孙志强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二月

“碎片化”的领导学，反映的是整个领导活动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体现的是领导活动中“点”的艺术，几乎每个领导干部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本书把深奥的理论通俗化、碎片化，使其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知识和实践工具。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建立社会文明秩序，要把小事当大事

北京曾推出行人闯红灯过街罚款10元的规定。违规者不肯给这10元怎么办？派3个执法者对1个违规者实施行政拘留，成本是10元？管理理性的城市居民要靠政府有理性。精细和透明的成本收益核算就是城市管理的理性和人民性，反之则是官僚主义。大都市的治理要遵循“精细计算治理成本”“把都市执法的重心放在居民区内”“用沉重罚则支撑所有禁令”“治理体系主要在惩恶，而非锦上添花”“要把基层执法队伍管成纪律严格、能协同作战的部

队”“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自治的决定性作用”等六大原则，六大原则环环相扣，构成一整套大都市的治理体系，给不断改善治理能力提供标准和空间。六大原则中，“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自治的决定性作用”最重要。党在基本性质上是扁平组织，其基本任务是组织动员居民，把群众组织为人民，维护人民的权利和权益，让公正和公平主导居民区的社会秩序，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让人民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去奋斗。

而今，我国有9000万共产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有1个，但我国都市居民区里没有共产党的支部。我国不断派员去新加坡学习社区管理，让那里的官员十分吃惊，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社区管理效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年的社区管理。

公共生活的宏观大事由科层体系办，公共生活的微观小事由社区组织办，居民的私事自己办。把小事当大事，视基层组织重于科层组织，我国能迅速建立都市的社会文明秩序。

为何说有时候政策比制度更重要

有时候，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有四个理由：

第一，制度是稳定的，长久不变的，但问题层出不穷，随时在变，需要灵活机动的政策来及时解决。立法易，废法难。解决日常问题要靠行政不能靠立法。出了问题就用立法解决不仅是懒政，而且法律必然繁琐、混乱、互相冲突。行政无所适从，就只能怠工。法律繁多是国家之祸而非国家之福，所以世上才有习惯法系。我国当前的问题显然不是缺制度，是以“缺少法律”为名的执法随意、懒惰。

第二，“政府法无明文授权不可行，个人法无明文禁止皆可行”是17世纪欧洲商人为制约国王提的一个口号。都21世纪了，国家开支普遍占GDP半数，哪国还在喊这四百年前旧欧

洲的口号？若法无明文授权不可行，不仅法律会多如牛毛，而且必然鲜有愿担当、敢作为的行政官员，懒政和怠工就是必然的。惯例法随机进选陪审团就是要断案服从本地百姓的意愿，拒绝法条主义。

第三，政策只惩罚犯罪的人，且因时、因地、因事轻重缓急不同；可叠床架屋的制度却惩罚所有人，而且惩罚诚实，迫使所有人不诚实。因极少数人婚姻欺诈就要立制度，要所有申请结婚的人民证明自己未婚，既大幅增加人民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的成本。制度门槛高了，政府效率低了，群众办事就得四处托门子，找关系，行贿赂。严惩欺诈者才是正道。“大道至简”。

第四，制度是特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不是生产和生活

方式的原因，不是国家成败的原因。制度貌似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其实能立住脚的制度都是“长出来”的。美国宪法是从英国宪政惯例和“五月花号公约”长出来的。国家出问题主要在政策不在制度。美国宪法好，却没能防止立宪八十年后爆发内战。郡县制好，秦朝寿命却仅十几年。科举制和宪政制好，创制的隋朝和民国都没活过半个世纪。西汉末王莽篡权照乌托邦大刀阔斧地改制，被历史无情嘲弄。

强调用全国一刀切的制度解决问题，忽略政策“试点”，轻视因地制宜，忽略我国各地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调动各地各部门官员的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老话新聊

桂晓燕

大千世界，纷纷扰扰，任何人都要与他人打交道。即使你是一个宅男或宅女，至少也得吃饭叫外卖是吧。你偶尔出门下次楼，在电梯里可能会碰到邻居；万一你生了病，那就更不得不到医院去找医生了。

与他人打交道，有时会产生一些意外或不快。比如你在外卖小哥送来的盒饭中，发现一只苍蝇；你走进电梯间，里面有人正在抽烟；你在医院排队候诊，有人偏偏硬要插队……这时候你怎么办？

阿拉老宁波对待这类问题的态度，有一句老话：“会讲话是先生

生，动手动脚是畜牲。”这句老话说出口很不文明，我们也反对如此表达，但此中的道理还是有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管有什么矛盾和纠纷，都应该用说理的办法来沟通、来化解，而不能依靠暴力来解决。你能说理，就是会讲话，就是先生；采取暴力，动手动脚，信奉“拳头大，做阿哥”，横蛮霸道，就会为人所不齿。

按照中国的传统，称先生是要有资格有条件的。并不是姓张的就是张先生，姓王的就是王先生。从字面意思来看，“先生”指出生比

会讲话是先生

自己早，年龄比自己大的人；引申为先于自己接触各类事物，比自己懂得早、懂得多的人。《辞海》对“先生”的释义，一是父兄，二是老师，并“引申为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也泛用为对人的敬称。”这句老话里的“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老宁波心目中，“先生”两字常常和有教养、有礼貌、有知识、有口才等词连在一起。

“会讲话是先生”，自古以来如此。晏子使楚、毛遂自荐、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蔺相如完璧归

赵、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些流传千古的成语典故，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位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的先生。

现在也有许多人会讲话，而且讲得相当精彩。例如前不久因“维权”爆红的西安奔驰车主王女士。王女士尽管出于激愤坐上了4S店的奔驰车引擎盖，但她一没有动手，二没有骂人，自始至终坚持说理。由于说得有根有据、有理有节，令对方辞穷理屈，不得不对她购车遭受的损失作出相应补偿。王女士靠舌战维权成功，让人们纷纷感叹会讲话的力量。

漫画角



投鼠忌“戚”

刘志永 绘

毋庸讳言，社会上也有令人遗憾的反面例子。如北京地铁8号线上发生过的一件事：一个胖女人上车后，指责一位小伙子占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座位。小伙子说，座位是大家的，我为什么不能坐？胖女人竟然扬手就抽了小伙子一个耳光，还伸出另一只手压住他的脖子，使他难以呼吸。小伙子怕事态升级没有还手，选择了报警。胖女人见状大怒，又狠抽小伙子一个耳光，并大声叫嚣：“你还敢报警？”“有种我试试！”……周围愤怒的乘客，录下了胖女人动手动脚的视频，传到网上，让她成了网红中的“丑角”。

“会讲话”和“动手动脚”，一个文明，一个野蛮；一个美好，一个丑陋；一个让人如沐春风，一个令人似遭冰霜。读者朋友，让我们人人都做会讲话的先生！